

# 忆夏公

曹积三



对夏衍先生，人们都爱称其夏公，既有亲切，更有敬重之意。

上个世纪30年代，他便是上海地下党的电影领导小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电影方面的领导职务，“文革”后，他仍是主持电影工作的主任。从左翼电影到红色经典时代，他是新中国电影的带头人，也是一面无形的旗帜。他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也有服众的著述，更有培养人才之功，电影人视其为权威，影界大加张骏祥先生有一妙比：中国电影的“老保姆老园丁”，恰如其分，岂有他哉！

夏公的创作思想影响了几代电影人，其作品也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

其实，他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路者、领导者，更是革命家。20年代初，他赴东瀛留学期间，就经孙中山介绍，加入革命阵营。白色恐怖最血腥的1927年，他于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长期开展地下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为人大立下许多不为人知的功勋。他是条“大鱼”，敌人无数次撒网捕捞他，一次都没有成功。可谓遇险无数，九死一生。

在“文革”中挨斗的他一身瘦骨，被从台上踢到台下，令其“交代”都“干了些啥”。他说：“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的。因为这个不属于我应该告诉你的范围。随便你怎样好了！”后来，他被关进监狱，锁骨被打断了，右腿被踢折了，党的大爱，组织秘密，人命关天的秘密，他就不说。吴祖光曾有诗云：“损目折肢事可伤，曾经百战战魔王。同龄世纪同功寿，谤溢江河罪满墙。”

这样一个共产党人，将自己从事的电影工作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30年代，从开场戏《狂流》始，到后来的《春蚕》《前程》《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等等，他始终把阶级压迫下的苦难民众作为关注的焦点。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百姓的疾苦与挣扎，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抉择成为他作品的主题。特别是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他怎么可能将电影变成宣扬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劳什子，而必然将其变为唤起民众奋起反抗、决绝战斗的鼙鼓和号角。他为田汉充实的剧本《风云儿女》，以及《同仇》《白云故乡》《时代的儿女》《自由神》《女儿经》《压岁钱》等等都是这样的热血之作、时代之声。

夏公的“武器”除了电影，还有报告文学和话剧，如《包身工》《心防》《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等等。他在银幕和舞台上，两栖作战，都是心系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充满对人民的大爱，跃动着的一颗赤子之心。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在夏公的电影花地上，有一片奇葩格外耀眼，那就是他改编的作家名篇，这是夏公的拿手好戏，堪称绝活。30年代的《春蚕》，由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雨江南》，则改编自葛琴的小说《结亲》。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相继把鲁迅和茅盾的小说《祝福》《林家铺子》搬上银幕。随后，又将陶铸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成《革命家庭》，将巴金的《憩园》改编成《故园春梦》，将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改编成《烈火中永生》。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电影力作，有的堪称经典。

夏公之改编，绝非依样画葫芦，既忠实于原作精髓，又不被原作所束缚，总是依据自己的审美精神和生活体验，对人物和情节加以独特的创造，赋予时代精神，使作品有所升华，或开掘出深一层的主题意义。

他在改编之后，常有深沉的凝思，写下经验之谈。诸如《杂谈改编》《谈〈林家铺子〉的改编》《漫谈改编》《对改编问题答客问》等等。这些对实践的审视、剖析和总结，既形成了夏公自己的理论，也为后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放眼影坛，对于改编，既有系统的理论建树，又有丰富的成功实践，并将二者结合得如此完美者，惟夏公独步。

著名导演如谢铁骕、王家乙、谢晋、桑弧等都沐浴过他的恩泽。对谢铁骕原名为《二月》的剧本，他改动有160多处，最后，将副名加上“早春”二字，也是由他建议的。在分镜头剧本上，他再次提醒道：将《二月》还是改为《早春二月》为好，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同时，还对剧中人物的拿捏把握提出中肯的建议，譬如对于钱正兴这个人物，就提示不能将他处理得很轻浮滑稽，更不宜丑化，等等。

《五朵金花》导演王家乙告诉我，剧本初稿写的是金花十二朵，夏公摇头道：“多了，只写五朵。”随后，作者边写他边改，直到片子开机。对于影片的整体构想，夏公言辞凿凿：“拍一部轻喜剧。要好看，耐看，人人爱看。别摆架子说空话，政治口号会让人疏远，片子里不要喊了。”王家乙一听，有些惊讶，夏公一脸的笑：“你只管拍，出了问题，我负责！用不用我写个条子？”王家乙连连摆手。其实周恩来



《五朵金花》电影剧照

来总理对这部影片已有过原则上的指示，所以夏公底气十足。

王家乙拿着尚方宝剑，率领摄影王春泉、美术卢浚、作曲雷振邦等一干人马，乘着一艘独木舟，沿澜沧江顺流而下，去撒撇坝接地气，又去大理三月街、蝴蝶泉等处采风……他们终于采撷到生活中的芬芳，将一部人美、歌美、景最美、人情美的影片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映出，一个美字惊艳了影坛。不仅赢得国内的观众，也受到海外影迷的追捧，它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映出，创下当时国产片在海外发行的最高记录。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赢得“最佳导演”的盛誉，主演杨丽萍捧得“最佳女演员”桂冠。

夏公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承受过巨大压力，甚至被威胁，被批判，被罢官。

对于将陶铸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搬上银幕，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就再三阻挠，开始称不知道有陶铸这么个人，言外之意她是假的，不真实；继之，又声言回忆录所歌颂的是错误路线，并威胁道：“片子拍成了我也不看！”

夏公不以为然，反驳道：“即便在错误路线时期，为党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应该铭记他们，学习他们那种勇敢地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

康生并未就此罢休，1962年12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递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由此展开对夏公的围剿。夏公精心扶植的《早春二月》，成为炮制“大毒草”的证据；倾注夏公激情的《烈火中永生》，遭到江青的横加挾伐。夏公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部优秀影片都变为他的“罪状”。就这样，夏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他的文化部副部长也被罢了官。加之，夏公太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底细，到了“文革”，他岂能不被“旗手”打人大牢呢。

在电影艺术家中，夏公是最有名望的革命家；而在革命家中，他是最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夏公是集大爱小爱于一身的人。生活中，他有许多雅好，爱猫、爱集邮、爱画、爱花，充盈着诗情。

夏公爱猫如子。他曾有过一只非常疼爱的大黄猫“博博”。“文革”中他被抓走后，猫咪一直等着主人回来。“博博”很有灵性，一遇到“造反派”来抄家，它就赶紧爬到树上，或蹲上房顶藏起来。“博博”天天等着主人回家，整整等了八年零七个月，等得它身体不支了，不能进食了，仍坚持在家里等着，等着，终于等到老主人出狱的那一天。当夏公拄着拐棍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博博”神似的站了起来，跑了过去，用身体擦蹭着夏公那条被打折过的右腿，“喵喵”地叫着，眼里透出无限的眷恋……第二天，它便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为此，夏公伤心多日。

夏公是集邮大家。他藏有1878年我国印制的第一套邮票清代龙票，包括大龙票、小龙票和红印花票，皆为稀世珍品，价值连城。他把包括这些邮票在内的233件珍贵邮票，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与此同时，夏公还把珍藏的“扬州八家”稀世珍品25幅，齐白石30幅，及吴昌硕、黄宾虹等名家101件书画，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他把自己的小爱，奉献给了大爱。

因工作机缘，我得以多次见到夏公，每次听到他讲话，总让人长见识，叫人感到新鲜。凡抨击时弊，令人振聋发聩。在编《中国影人诗选》时，我收集了1984年夏公致宋振庭信中的那首打油诗《整人》，诗云：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不剃胡须，不剃成秃头。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这虽然是一首打油诗，内涵却不可小觑。

这是夏公对整人的厌恶、反思和省悟。纵观几十年风云变幻，他饱尝荣辱沉浮，透过这诗，可窥见其内心的坦然、淡定和从容、达观。

那一年，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电影界的重要座谈会，我担任记录。会议结束后，我送夏公回去，同他握别时，觉得他的手很有力量，让我很惊讶；更惊讶的是，他拉着我的手，问及我的工作情况和写作的一些情况，激励和关爱打中中来。夏公尽管身系要务，却还记挂着下面的工作人员，叫人顿生感慨。

1995年2月6日，享年九秩又五的夏公溘然长逝，以他为代表的时代——中国电影的经典时代落下了帷幕。可我的心头一直响着阳翰笙老在为《中国影人诗选》的序言中，引用夏公的那首诗：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  
天快亮，  
我们颂赞我们的英雄。  
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惫的圣·克里斯托夫，  
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他没有走，在银幕上，在书卷中，在心底里。  
百年夏公，一个大写的人，矗立在天地之间。

# 我所认识的故宫掌门人——马衡

口万伯翱



犯，才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我战犯收容所。

## 阻止废除故宫博物院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黄郛摄政内閣主政。11月7日，临时执政府颁发命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马衡以金石学家身份和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一起受聘于善后委员会，参加了清官室物品的点查工作，他就此一生和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翌年10月，在清官善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故宫博物院，马衡和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等九人被推举为临时理事会理事，继续参与故宫博物院的保护和建设工作。

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缺乏，故宫博物院处境艰难，马衡和各界人士一起为保存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自嘲为：捧着金饭碗去乞讨。一方面继续清点清宫庞杂的大小各种遗物，另一方面则积极筹建两馆一处。期间，马衡与王国维、胡适、蔡元培、陈恒等大腕名士们过从甚密，仅与王国维的往来通信就多达87封，多为交流考古学术问题。若遇上拿捏不准的文物，二人交换意见后基本就可定级。2017年，马思猛还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一书，对此做了详细记载，见证了这一代大师在乱世中的学术坚守。据马思猛讲，马衡当时负责古物馆，但不拿薪水，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做义工呢，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只在北大拿工资而已。

为了避免文物遭破坏，包括马衡在内的一批学者又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文物的艰难而重要的使命。特别是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了一项议案，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马衡等五人被推举为代表进行抗争。后来，他们通过传单向蒋介石等不断游说使得国民党在第155次中政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否决经亨颐议案，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至此，故宫博物院才被完好保留下来。

故宫能成为今天的故宫，倾注了以马衡为首的一大批近现代学者和工作人员的血汗，建院初期的故宫是靠一些知名人士的捐款维持开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专拨款，到处要钱。让马衡做梦也想不到的是，21世纪的故宫已经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美法德俄印等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先后踏入故宫大门，获得世界肯定。2019年接待了1900万人次，仅门票收入就达8亿元人民币左右，还有一项高数额的创收高达15亿元，让故宫火得不得了。与当年马衡的保护建设经费捉襟见肘，真是云泥之别了。

## 战火中护宝

1933年7月，马衡面临受命经众人推荐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并于次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继任院长后，马衡一方面积极进行故宫留北平文物的清点以及南迁文物的点收、安置工作，同时往返于北平、上海、南京之间，为南迁文物存放新址的选择和修建而奔走呼吁。

1934年12月，经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议通过，决定将南京朝天宫作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办公、展览及文物储存地点，用以存放全部南迁至沪的文物。1936年3月，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8月竣工。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挂牌成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又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马衡、马彦祥（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著名戏剧家）父子成了护送文物的上阵父子兵。他们

带队暂时安顿好“中线”之后到长沙，发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三面环山，若在这里凿洞存放文物，会比较隐蔽。几周后山洞凿好。这时马衡突接密电，得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便紧急组织文物又向贵州转移。装文物的车队刚刚离开，多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刹时这里皆被夷为平地。

在故宫文物南迁、西迁期间，正是由于以马衡为首的团队不顾性命、不辞劳苦严谨负责的出色工作，才使得西迁文物都能找到较好的保存地点，免于兵火之厄。这不得不说“文物南迁”而又完璧归赵是抗战中的一个奇迹，也是一项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壮举。

## 巧阻国宝赴台

1945年，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46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文物展览，要求故宫选送部分新入藏的文物参展，有关人士提出将部分青铜器暂留南京，立刻被马衡婉言拒绝。否则，这些国宝难保后来不被运到台湾。

对于战时南迁文物，马衡极力主张全部运回北京，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而被迁至南京收藏。到了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在南京分院的文物精华分成3批运往台湾，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分批空运到南京。对此，马衡表面上遵从命令，也着手进行装箱，实际上却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一再嘱咐安全第一，致使工作进展缓慢。此后，当局一再催促，马衡不是推托“当前机场不够安全，暂时不能起运”，就是声称“自己心脏不好，遭医嘱不能离开”，实际上马衡一直在和地下党秘密接触，始终没有运走一箱文物，仍都安放在北京故宫了。

马衡是一直极力反对将故宫文物迁往台湾的。马衡的学生兼下属庄严奉命押运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马衡知悉后立即致函庄严，声称如果庄严要护送文物去台湾，他不惜与庄严断绝20多年的师生之情。

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想离开与他生命一样重要的北平和故宫而前往台湾。南京方面多次派飞机接运国民党在北平的高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年过花甲的马衡也是“应走”而未走的一位故宫掌门人，毅然决然选择就是不走，因为他要留下保护故宫、看守稀世国宝。

抗战期间转移国宝，积极南迁；解放前夕维护国宝，抵制迁台。两种截然相反的姿态，是马衡对故宫、对国人，乃至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

## 逝后捐献全部家宝

马衡仙逝后，家属遵其遗嘱将其一生所集文物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包括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铭刻、碑帖拓片、工艺品、书画和图书等。先生共捐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金石类占其全部藏书30%。人生来去皆匆匆，马衡两袖清风而西去，永远令后来人高山仰止。

在堆积如山的马衡先生捐赠品中，其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帖、造型、石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雕细琢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馆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其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溥邨、钟以敬、吴隐、王愷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各种字体的印章及个人藏品。同样，马衡的儿子马彦祥伯伯生前逝后也将全部马氏藏书等文献资料再次捐赠给国家，现在走进第三代思猛兄在通州太玉园不过百米左右的住所，家中已无一张悬挂四壁的名人字画，更没有一件古籍、古董之类的珍藏。这样的马家三代两袖清风的故宫后人，再也难以寻觅了。

写到最后，以刚刚退休的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的一句话评价送给马衡爷爷：“他是捍卫国家宝藏、延续文化命脉而奋斗一生的守护者！”可喜的是马衡的全部作品日记、书信、年谱，在马思猛亲自主持写作编辑中，已由故宫博物院今年即出版发行了！